

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建设机理与实践路径

■ 良警宇 罗秋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革命文物具有多重价值,是“大思政课”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关键在于延伸其社会生命,形成使深层规则得以运作的机制。当前,“大思政课”项目实践基于场所、流动和数字服务的模式,坚持政治引领、传史育人、守正创新,通过构建馆校合作机制,建设融合育人共同体,探索了依托革命遗址和纪念馆等特色资源创新开展“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以革命文物故事作为“小切口”诠释革命精神“大道理”,开发融媒体平台和数字文化产品以拓展优质资源影响力的建设路径。为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铸魂育人成效,需要进一步突出实践导向,坚持“三全育人”,搭建更广泛的合作平台;加强课内外的互动和应用环节,促进心理—人格结构和惯习的养成;强化实践导向的成效评估机制,促进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

【关键词】革命文物 “大思政课” “三全育人”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1.005

革命文物是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持续奋斗的百余年历程,我国积累形成了数量丰富、分布广泛、类型多样的革命文物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工作加快推进。根据国家文物局的专项调查,截至2021年,全国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3.6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有100多万件/套。与此同时,收藏、保护和展示革命文物的革命场馆体系基本形成,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等革命纪念馆总数超过1600家^[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良警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化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志愿服务等;

罗秋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化社会学、社会工作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志愿服务与首都红色文化建设——以北京地区红色文化遗址和革命纪念馆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道中华’融入‘社会科学理论前沿’课程建设探索”(课题编号:GRSDZH202308)、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数字化知识管理的社会学理论类课程教学改革探索”(课题编号:GRSJYGG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2],并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3]。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和“大思政课”的指示精神,继2021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 协同育人”来推进革命文物资源高质量、全方位融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后,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又联合开展了以革命文物为主要内容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广工作,并推选首批示范项目和精品项目^[4]。全国各地对于如何将革命文物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发挥其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铸魂育人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探索,但对于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学理研究亟需加强。因此,本文在进行理论探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项目实践,探讨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建设路径及其优化措施,为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的价值、推动“大思政课”的建设提出建议。

一、革命文物的价值及其合理利用

(一)革命文物的定义及其内涵

探讨革命文物的价值及其合理利用,需要首先明确其定义和内涵。在我国,“革命文物”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充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曾有从“烈士遗物”到“革命纪念物品”,再到“革命历史文物”的概念表述^[5]。1950年我国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革命文物”作为专门术语被正式提出,保护革命文物也开始被纳入到国家法律层面。1982年11月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经了5次修正和1次修订,在2002年全面修订的版本中,革命文物被置于“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范畴中,数量和类型得到了新的扩展^[6]。2020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革命文物”这一类别,将“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单列,以区别于“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类型^[7],鲜明地标识出革命文物的基本对象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相关,强调了革命文物作为历史见证物的“四史”范畴。本研究关于革命文物的定义也采用了这一范畴。但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时期的政策文件、收藏保护实践及其研究中,对革命文物的时间范畴的定义不同,许多被追溯至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时期,因而也纳入了该时期其他革命运动的实物和资料。

革命文物按其本身属性,可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类文物包括有关的史迹、建筑、旧址、遗址;可移动类文物则主要指国有、非国有文博场馆典藏的革命文物。按照国家文物定级标准,革命文物被划分为三个品级类别,其中三级以上为珍贵文物,其他为一般文物,另外一些价值略低的收藏则被归为参考资料类。同时,革命文物作为革命文化的载体,还以非物质形态呈现和传承,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即属于非物质革命文化遗产,在一些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中即规定红色遗存和革命精神亦属于革命文物范畴^[8]。

（二）革命文物的价值及其合理利用

改革开放后,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文物保护经历了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过程^[9]。传统的文物保护强调文物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即所具有的物证价值和史料价值,如这一认识就明确体现在2000年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①中。在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2015年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则进一步明确了文物古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社会价值包含了记忆、情感、教育等内容,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文化价值则包含了文化多样性、文化传统的延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等相关内容^[10]。

上述对革命文物价值构成的认识,强调除需要考察其革命文物有作为革命历史见证物的价值,还应重视其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中指出,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11],这一表述对革命文物所具有的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相统一的多重价值和作用进行了总结凝练。各类分散的革命文物及其承载的信息依据其思想内涵、历史脉络等要素的相互联系,可以跨越时空构建出完整的革命文化的精神谱系和价值链条,并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体系性特征。此外,在新时期,革命文物也契合了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资政育人、引领经济的作用,体现为多元的综合价值,兼具了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品牌价值^[12]。

从上述文物价值的视域出发,合理利用是文物保护的应有之义。革命文物的社会价值可被视为其作用于社会之广度和深度的总和。为了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的社会价值,需要充分挖掘其多面的复合价值,即“在文物单一的原本的直观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综合、整理、加工后所产生的系统地反映文物本质的价值”^②,以此揭示出革命文物蕴含的革命历史、故事、人物、精神的要素关系,并拓展社会传播面,从而使静置的文物能够“言说”历史,激励人心,更好地实现革命文物在记录和传播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凝聚社会人心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

二、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机理逻辑

革命文物不仅是物质实体,也是承载革命文化理想和价值意义的符号,从而成为思政课内容的资源。革命文物具有多重价值,但“物”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自显的,如何使其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得以挖掘和体现,由“物”达至滋养人的精神,并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激励其行动,来

① 2000年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订、通过,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向社会公布。

② 文物的价值按其层次可划分为本元价值和复合价值,本元价值是指文物单一的原本的直观价值。参见梁华平:《略论博物馆价值及其开发》,载《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1期。

实现“大思政课”的建设目标,关键在于能否延伸“物”的社会生命,以及形成使其深层规则得以运作的机制。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机理逻辑进行分析,以深入认识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学理基础和建设路径。

(一)“物”的符号意义与革命文物的精神表征

革命文物作为革命文化的载体,涉及关于“物”的多层次的认知维度。基于物质文化分析的视角,物品(objects)可被视为具有物质器物(material artifacts)、符号和象征物(signs and symbols)以及物品所涵盖“意义”(meaning)等方面的意涵^[13]。“物”如同词语一样,可以构成一个总体性的、随机性的和连贯性的符号系统,一个代表价值和意义秩序的文化系统^[14]。物的系统不是独立于主体意义和文化意义而存在,而是作为他们的符号和载体,而成为物质文化。在一定的机制作用下,物的系统和意义系统构成了“能指”(sigifier)和“所指”(the signified)的对应关系。此外,物还可以通过社会行为者的应用行为来创造社会^[15],因而被视为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构过程的行动者。

革命文物作为载体使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具有了可感知、可观察的外观感性形态,使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传承有了载体和媒介,并得以在空间上向外扩散、在时间上积累传承。具体而言,作为物质载体和符号系统,革命文物凝结了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持续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追求、精神品格、精神力量的表征^[16]。其所承载的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17],都通过一件件器物、一处处革命遗址,而使历史得以记忆和重现,并由此汇成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革命文物蕴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密码,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载体^[18],是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的最好见证。因此,革命文物是开展“大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时代新人成长成才提供精神动力的最好引入。

(二)“物”的社会生命与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

“物”的社会价值并不是自显的,需要使之意义彰显,并与社会进行互动才能使其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得以活化体现和传承。“物”同人一样有自己的社会生命,物的社会生命只有通过它与人的关系才能得到说明,“物既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空间,也是文化体系中的行动者和实践者”^[19]。在国际遗产研究中,许多学者强调文物价值在行动中产生,文化遗产是被赋值的过程,从而将文物的价值定义为“由社会交往而赋予物的品质”,是人类活动进程中所扮演的关系和角色^[20],提出“文物的价值是人为构建的”^[21]。由此,自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学界对遗产的价值认知,开始从强调固有的历史价值转向了同时强调其被赋予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强调要将文物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和社会语境之中进行保护,认为持续不断的保护行动本身也“构建和实现了每一代人类个体、组织、社群在文物上所投射的价值认知。而这种认知,将连结起我们的过往和未来”^[22]。因此,文物的价值不仅在考古行动、研究行动以及修复

保护行动中产生,同样也在合理性活化利用的行动中产生。

革命文物作为革命实践的产物,作为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实践和革命历史过程的见证物,同时也是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来赋予互动对象以情感和主观意义,从而使革命文物具有了社会性情感价值,并完成赋予其情感化、神圣化的过程。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物的符号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在与社会和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因此,为了更好地传承革命文化、赓续红色基因,需要以革命文物作为线索和载体,通过多样化的社会教育活动,来全面有效地传达革命文物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和价值,多维度、多切面地展现历史,让观众在革命文物与革命文化意义及价值之间建立联结。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是对文物最有效的保护方式,其活化利用的关键在于通过创新观众接收路径,以达到让观众感知文物传达的精神及价值意义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23]，“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24]。“大思政课”是对传统以“学校小课堂”和“思政课”为主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25],于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而言,将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拓展了革命文化的传播方式和路径,让更多的学生深刻理解文物所承载的符号价值及意义,实现了革命文物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于“大思政课”的建设而言,革命文物的融入能改善传统思政课堂的枯燥干巴,让学生更直观、沉浸式地感受革命精神。将革命文物和“大思政课”二者融合在一起,可以更有效地发挥铸魂育人的效果。

(三)“物”的深层规则与“大思政课”的建设机理

革命文物作为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种具有结构性、层次性、统一性的总体系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文化的载体、规则和意义(或内涵)的统一,是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意义结构的统一^[26]。作为载体要素的“深层结构”,是由集体创造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和调节载体要素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规则,体现了社会性的一面。离开了一定的物质载体,文化就脱离了存在、延续和传播的媒介;离开了“意义结构”,物质载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功能和价值;而离开了“深层规则”,物质载体和意义就失去了联系的纽带。革命文物的意义得到社会群体的共同认知和理解,就需要具备得到社会成员一致理解和共同拥有的,具有相对稳定性、普遍性和连续性的社会意义,而这种作为主体间性的社会意义的形成,离不开“深层结构”即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的支配和制约。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是通过社会化过程而内化为每一代人的心理—人格结构而发生作用并得到传承的。培养社会成员具有受规范和习惯支配的有序的、模式化和连贯化的行为方式,就要建立一套对革命文物进行正确解读和编码的规则,并通过有效的社会教育方式,传达至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需要通过法律、道德等意识的提升、日常性和仪式性习俗的养成以及意识形态的维持等方式来保证编码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大思政课”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以及各类保障促进系统的协同合作来调解和影响每个社会成员和家庭,因此建立政策法规保障体系,建立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协同关系,发挥协同育人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深层结构”的建设任务,

形成协同育人的教育机制。

三、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为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开门办思政课,加快构建“大思政课”工作格局,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要以新成就、新经验、新技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样态;要通过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27],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为此,教育部等八部门首批分7个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28],其中就包括了81个“党史新中国史教育专题实践教学基地”,100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为进一步推动革命文物工作与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融合发展,国家文物局、教育部联合开展了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广工作,并推选首批示范项目和精品项目^[29]。这些创新实践成果,坚持革命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原则,结合场所、流动和数字服务的模式,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场所资源,创新开展场景化、体验式、情境式的“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以革命文物故事作为“小切口”,诠释革命精神“大道理”;拓展融媒体平台和开发数字文化产品,扩大优质资源影响力;构建馆校合作机制,建设融合育人共同体,推动了革命文物思政教育的新发展。

(一)依托场所特色资源,建设“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

我国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革命文物遗址,以及各类收藏革命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凝聚了革命文化的价值精华,成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各地依托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场所资源,探索形成了一批场景化、体验式、情境式的“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品牌。

“纪念馆里的思政课”。为了发挥好“大思政课”教学基地的作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爱国主义教育专班,借助丰富的馆藏史料文物与南京大学等学校合作开发了针对大、中、小学的分众化的“六个一课”教学课程:面向高中行将毕业出国留学的“行前一课”;面向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员的“入伍一课”;面向港澳台侨各界人士的“复兴一课”;面向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从教一课”;面向新入职的党员、干部开设的“入职一课”;面向留学归国人员的“归国一课”。此外,纪念馆还推出了“以史为鉴课”“证言倾听课”“缅怀仪式课”“遗址寻访课”等,结合专家讲座、劳育课程、实地参观等方式,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来加强学习体验,传播爱国主义与和平理念^[3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自2014年以来,联合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开展“学英烈事迹、诵抗战经典、做红色传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覆盖北京市600多所中学、近60万名学生。通过“爱我中华”升旗仪式、学唱抗战歌曲、参观展览情景教学、抗战生活互动体验、党史学习教育小课堂、国防教育大课堂等丰富的活动形式,将抗战史料转化为青少年思政教育鲜活的教学资源,引导青少年爱国、励志、求真、力行,将成长成才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光辉伟业^[31]。

“行走的思政课”。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韶山下的思政课”,组织高校专家及研究生到韶山,重走毛泽东少年求学路、游学路、社会调查路,听专家授课、举

行青春辩论会等,并结合当代青少年关注的话题,共同设计课程打造微纪录片,引发了强烈反响^[32]。陕西省联合10所高校实践团队开展的“新时代青年延安行——革命文物融入思政课社会实践活动”,追溯抗战时期爱国进步青年北上延安的足迹,从西安行进400公里至延安,以沿路实地调研、现场教学等形式,引导师生切身体悟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理想与信仰之路,并结合学科专长,对沿线革命文物保护及其赋能老区发展提出对策^[33]。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自2010年开始,每年组织本科生到刘公岛爱国主义基地开展“开学第一课”思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爱国宣誓、参观游览、体验教学、主题征文等环节,带领学生感悟峥嵘历史,坚定“四个自信”,赓续红色血脉,涵养家国情怀;通过与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院共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不断推进革命文物研究、保护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发展^[34]。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开展的“北京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突出学生、学科、学术,通过开展博物馆参访、大讲堂进校园对话、口述史访谈、案例研究、文创作品征集、大中小学生文化骑行、文艺展演、国际青年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增进情感与信仰、知识与能力、学术与创造;充分发挥大中小学学段特点和学科优势,大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并作为首批推荐示范课程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35-36]。

(二)以挖掘文物作为故事“小切口”,诠释革命精神“大道理”

在发挥遗址和博物馆场所作用的同时,许多博物馆也通过流动服务形式来传播革命文物蕴含的革命精神,在深入挖掘革命文物复合价值的基础上,把道理蕴于故事中,以物证史、以事感人、托物言志,从文物故事“小切口”,诠释革命精神“大道理”,并将小故事的讲述转化为主题巡展、微党课、情景剧、音乐剧、主题读物等形式,进校园、进课堂,以增强“大思政课”的感染力。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自2021年开始,跨越三载与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合作,开展“‘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文物藏品进课堂活动”。纪念馆以近40人的工作团队砥砺深耕,从全馆12.8万件(套)文物中精选百件文物藏品,结合思政教育内容,转化制作了100个有温度、有高度、有深度的红色小故事作为思政课教学案例,由纪念馆的文物保管员、宣讲员带着这些文物和故事走进100个校园的德育课堂,使学生在历史与现实生活间建立桥梁,跨越时空感受革命精神的力量^[37]。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浙江大学,依托共建的“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推出“革命文物映初心 红船起航高校行——行走的思政课”创新型教育实践项目。项目依托“红船宣讲小分队”,通过微党课、情景剧、红色故事等形式,把馆藏革命文物蕴含的精神内涵送到广大学子身边,2022年以来开展宣教活动100余场次,受众超10万人次^[38]。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重庆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活动。展演既请进来,也走出去,采取“讲、诵、展、演”等方式,创新展示革命文物,讲述革命事迹,诵读先辈诗抄,生动演绎历史事件,使思想性和理论性、针对性和教育性、亲和力和艺术性相融。自2020年首演至今,已超过500场,现场观众43万余人次^[39]。

(三)开发融媒体平台和数字文化产品,扩大优质资源影响力

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年轻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以国家智慧

教育平台、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建设为契机,使用新技术、新手段,开发数字文化产品,借助融媒体平台,打造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数字化学习环境,以扩大革命文物资源项目的影响力,是新时代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着力探索的方向。许多文博单位与学校合作,积极开发小视频、短音频、微电影、动漫等数字产品,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云展览、云直播,开发小程序、AR/VR互动体验、虚拟仿真课堂等,扩大优质资源项目影响力。上海中共四大纪念馆联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立足自身文化资源,制作“力量之源·红色100”系列红色故事视频,用沪语讲述100个红色小故事,持续通过微剧情、小故事、短视频等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把红色故事带给更多年轻人^[40]。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开发“云说文物”“历史微课”“紫金草和平云讲堂”等系列网络思政微课,打造“云上大思政”,让历史知识借助云端传向世界,提升了“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力^[41]。湖南博物院推出的“‘好好学习’文博系列课程之阅读湖湘红色之旅”线上课程,梳理全省红色资源,邀请长沙市初中、高中、大学学生代表作为体验官参与课程录制,开发由线上线下课程、教育盒子及教具组成的项目的完整体系,打造了“红色基因+云端课程+线上游学”教学新模式^[42];借助融合传媒、矩阵传播优势与各类平台合作进行推送,形成宣传矩阵,线上课程阅读量达42万次^[43]。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与黄继光纪念馆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思政教育与国防教育,合作开发“黄继光思政虚拟仿真体验教学项目”,运用VR技术展现黄继光的革命精神及其英勇事迹的经历缘由,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让教学表达从“单模态”转向“多模态”,让学生学习从“旁观者”转向“局中人”^[44]。西南财经大学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联合打造的“飞夺泸定桥VR·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项目”,通过3D场景建模、虚拟仿真等技术手段,全面真实地展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革命历史场景。学生通过插入式交互任务,体验参与战争的过程,使教学呈现更生动、学习主体更主动^[45],让学子们在身临其境之中触摸历史、升华认知、激荡情怀。

(四)构建馆校协同合作机制,建设融合育人共同体

形成大思政课协同育人工作格局,需要把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的一切育人主体和要素广泛调动起来,把各类优秀育人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完善协同合作育人机制,才能发挥合力育人的最大效应。为此,馆校之间通过建设合作平台,建立专家、教师和博物馆人员的双向兼职合作机制,共同开展培训研习,建立联合科研平台、志愿服务和实习实践平台,推动了融合育人共同体的构建。

建设“大思政课”融合育人共同体。武汉革命博物馆与武昌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盟,通过理论联学、活动联办、课程联讲、资源共享的方式,联合打造了思政课程实践品牌——“红巷里的思政课”。思政宣讲人根据不同的宣讲对象,宣讲党的理论,每月推出一期系列课程,包括了由联盟高校组织知名专家、学者轮流讲授的“红巷思政理论课”、由大学生志愿者展开的“红巷青马微宣讲”、由中小学生志愿者“红巷苗苗”讲述红色故事的“红巷苗苗故事汇”,以及着力打造的“武汉1927”沉浸式思政课,使“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衔接,营造了浓厚的学思践悟实践教学氛围^[46]。南开大学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共同建设“纪念馆+高校”的“大思政课”融合育人共同体,坚持十年开展苏区实践“大思政课”,通过激活红色资源、多元主体和实践成果,深挖“大课堂”育人潜力,构建“大师资”育人体系,拓宽“大平台”育

人渠道,对善用“大思政课”讲道理、提升育人成效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探索^[47]。由淮海战役纪念馆、徐州市教育局联合打造的“淮海战役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三三三”工程”,以馆校融合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打造了纪念馆、学校和线上的“三大课堂”,针对青少年成长期的大、中、小学生“三个阶段”,创新了“情景式、体验式、互动式”的课程“三种形式”^[48]。中国电影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光影看中国——‘电影中的党史大课’系列课程活动”,邀请电影艺术家、党史专家与高校思政课教师组成“光影讲师团”,结合主旋律影片,通过“展映+导赏”、电影讲堂、主创见面会、座谈会、主题宣讲等形式,让大学生在光影课堂中重温党的百年历史、牢记党的初心使命^[49]。

在志愿服务实践中铸魂育人。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发挥实践育人作用”项目依托有关文物、展览和原状陈列,面向大中小学开展志愿讲解项目,引导广大青少年讲述宋庆龄的故事、了解文物的思想内涵,在志愿讲解实践中铸魂育人^[50]。

四、总结与思考

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和“大思政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革命文物具有多重价值,需要在保护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复合价值,并通过合理利用延伸其社会生命,形成使其深层规则得以运作的机制,才能实现革命文物铸魂育人的作用。当前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项目实践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发挥革命文物作为思政课的“活教材”作用,坚持政治引领、传史育人、守正创新,通过构建馆校合作机制,建设融合育人共同体,探索了依托革命遗址和纪念馆等特色资源,创新开展“纪念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以革命文物故事作为“小切口”,诠释革命精神“大道理”;开发融媒体平台和数字文化产品,扩大优质资源影响力的建设路径,形成了一系列示范成果。但从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机理逻辑和“三全育人”的要求来看,还存在可进一步优化和加强的环节。

第一,进一步搭建更广泛的合作平台,延伸革命文物的社会生命。当前,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主要体现为馆校协同机制的构建,为进一步推动“大思政课”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搭建更广泛的合作平台,在馆校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课堂”半径,促进包括馆校、社区、家庭、企事业单位等更多主体的协同联动。如前所述,革命文物的社会价值可被视为其作用于社会之广度和深度的总和。建设好“大思政课”不仅要畅通馆校合作机制,还要进一步推动“馆校+”的联建联学联动,以进一步延伸革命文物的社会生命,把革命文物思政课的场域有效扩展至更大的社会大舞台,促进“深层结构”的建设,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对革命文物意义的共同理解和享有,以更好地实现革命文物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第二,进一步加强互动和应用环节,促进学生心理—人格结构和惯习的养成。革命文物的价值和意义顺利有效传达,既依赖于其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也依赖于接受者的理解或认识和解码。共同理解规则的建立需要在主体体验、互动和分享交流的具身性行动中加强。因

此,应更多地创设交流和应用情境,增设课内学习成员之间以及课外的交流讨论和互动环节,激发学生进一步主动关注和讲述、交流革命文物故事的热情,探索构建不同学段学生互动互促互助平台以及与家庭、社会的互动平台,在互动、实践、应用的学习过程中感受、体悟和提升应用能力,真正将革命文物蕴含的思想、精神内化为自身的心理—人格结构和惯习,实现革命文物铸魂育人的价值。

第三,强化实践导向的成绩成效评估,完善激励师生活化利用革命文物的机制。强化实践导向的成效评估是促进理论与实践贯通、客体与主体联通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将革命文物融入“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成果要求纳入学生成绩评定和课程成效评估,在成绩和成效评估项中增加再创作和服务实践成效的激励性要求,鼓励师生活化利用革命文物,提高综合应用能力和理论素养,引导学生在实践锤炼和创造性学习中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载《中国文物报》,2022年1月4日。
- [2] 《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30/c_1127272899.htm
- [3][24]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载《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
- [4][29]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项目名单的通知》,http://www.ncha.gov.cn/art/2023/11/27/art_2318_46441.html
- [5] 朱宇华 李博文:《革命文物概念发展过程及演变——从苏联到中国当代》,载《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载《浙江政报》,2003年第2期。
- [7] 《国家文物局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http://www.ncha.gov.cn/art/2020/11/10/art_2318_44219.html
- [8][12] 李 娉:《文物三调:山东革命文物的典藏、保护与利用》,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版,第17-18、10页。
- [9] 吕 舟:《〈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修订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载《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第2期。
- [10]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http://www.ncha.gov.cn/art/2018/7/29/art_2376_162451.html
- [13] 潘守永:《物质文化研究: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
- [14][26] 王 宁:《消费社会学》(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版,第115-116、103页。
- [15] 伊恩·霍德 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徐 坚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6页。
- [16] 秦 洁:《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载《红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 [17]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09/29/c_1127917872.htm
- [18] 刘晓哲 魏 巍:《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的理论价值及实践价值》,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2期。
- [19] 张 进 王 珪:《物的社会生命与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论》,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 [20][21][22] 周孟圆 杜晓帆:《文物的价值在行动中产生——文物价值认定的前沿理念与经验》,载《故宫博物院院

刊》，2019年第1期。

[23]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载《求是》,2020年第17期。

[25] 张 夏 吴宏政:《论“大思政课”的方法论根据》,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7]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18_653672.html

[28] 《教育部办公厅等八部门关于公布“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26_655615.html

[30][41] 徐红霞 窦心蕊:《用“六个一课”上好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的“大思政课”》, <http://www.js.xinhuanet.com/20231129/403629b480b84ad99c815e381614cea1/c.html>

[31] 李莹莹:《抗战馆“学英烈事迹 诵抗战经典 做红色传人”主题教育活动入选全国“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十佳示范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TMwOTk5NA==&mid=2247589702&idx=1&sn=216fb31acde6836cc6fec858-d9570a93

[32][42] 龙文洪 柴 冰:《湖南7个项目入选“大思政课”优质资源项目名单》, <https://hunan.voc.com.cn/article/202312/202312-060701166603.html>

[33] 郭诗梦:《陕西“新时代青年延安行”入选全国“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示范项目名单》,载《陕西日报》,2023年11月29日。

[34]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刘公岛开学第一课”获评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示范项目》, <https://mlb.wh.sdu.edu.cn/info/1152/7239.htm>

[35] 李祺瑶:《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入选国家优质资源示范项目》, https://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2311/t20231128_3311334.html

[36][40] 刘源隆:《用好红色文物 讲好红色故事》,载《中国文化报》,2023年12月4日。

[37] 中共一大纪念馆:《蒙以养正 润心笃行——记中共一大纪念馆百场“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活动》, <https://www.zgyd1921.com/about/news/986d8daaa4ff46dcb88cc22fa0608ff.html>

[38] 李 源:《全国示范+精品! 嘉兴两个项目入选》, <http://zjnews.china.com.cn/zj/jiaxing/2023-11-29/401274.html>

[39]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岩革命故事展演入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示范项目》, <https://www.hongyan.info/info/1007/21730.htm>

[43] 谢丽丽:《湘博“阅读湖湘 红色之旅”教育项目入选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 http://wwj.hunan.gov.cn/wwj/c100310/c100313/202212/t20221212_29158483.html

[4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级! 成都航院一项目入选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名单》, <https://www.cap.edu.cn/info/1058/112484.htm>

[45]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国百个“大思政课”优质资源项目公布,西财上榜!》, <https://mks.swufe.edu.cn/info/1061/5335.htm>

[46] 黄丽珑 雷 宇:《红巷里的思政课》,载《中国青年报》,2023年9月12日。

[47] 刘一博 张登彬:《善用“大思政课”讲道理:南开大学十年苏区实践的探索与经验》,载《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0期。

[48] 张 瑾:《淮海战役“大思政课”上榜》, https://jsnews.jschina.com.cn/xz/a/202311/t20231128_3324911.shtml

[49] 赵 宇:《“光影看中国”入选全国“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IxM-DQ1Mw==&mid=2684913320&idx=2&sn=07f38a4e08af94862f0c4aa3a0e9be93

[50]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故居入选全国百个“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 <http://www.sql.org.cn/gjxw/5540.html>

(责任编辑:韩永涛)